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关系研究

杨 蓉, 刘婷婷, 王 雯

[摘要] 本文以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对象, 建立大学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大学价值增值衡量标准, 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我国大学治理能力及大学价值在逐步提高; 相对于内部治理, 外部治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较大; 外部治理中, 相较于政府监督, 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更大; 内部治理中, 相对于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大学章程, 学术委员会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更大。

[关键词] 大学治理; 价值增值; 灰色关联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且针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 即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引导高校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三五规划》无不体现出我国政府对大学价值的高标准要求, 即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以促进大学价值增值。大学价值增值离不开大学治理体系的完善, 大学治理能力在提升大学价值增值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要改革教育治理体系, 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因此, 改善大学治理能力, 提升大学价值增值是当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 如何通过大学治理提升大学价值增值? 不同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否对大学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 具

[收稿日期] 2018-11-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学治理、财务管理和价值增值的关系研究”(71573090)。

[作者简介] 杨蓉,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电子邮箱地址: ryang@dbm.ecnu.edu.cn; 刘婷婷,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电子邮箱地址: tingzikkkk@163.com; 王雯,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电子邮箱地址: wangwenms@hotmail.com。

体到工作落实中，高校应该选择大学治理的哪部分作为切入点，重点加强哪部分大学治理能力，以尽快提升大学价值增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是实践工作的强烈要求，亟需我们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做出回答。

一、文献综述

“大学治理”最早由美国学者科尔森在《大学和学院的治理》一书中提出，将其大学治理定义为：基于大学内部不同部门人员的责任分工和权力决策，它代表着教师和管理人员等不同利益方的权力和责任诉求(Corson, 1960)。Birnbaum(2004)认为大学治理是“平衡两种不同的但都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结构和过程，即董事会、行政机构拥有的权力和教师拥有的权力”。Gayle等(2003)进一步将大学治理拓展到外部治理，指出大学治理的实质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大学内外部各种决策权力在各个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与行使，包括权力分配结构和权力行使过程两个互相匹配的方面。我国学界对于大学治理的公开讨论始于张维迎(2004)，他认为大学的目标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安排来实现，这些制度的安排就是治理结构，就是大学的治理。罗红艳(2014)认为，大学治理是指一套关于大学内外部利益关系主体参与大学重大决策与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荀渊(2014)认为，大学治理更关注政府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各主体之间在决策层面的民主协商。李立国(2018)认为大学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知识之间的关联，大学本身无法自立于多种力量之外。

根据大学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学必须要正确处理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更完善、更能体现各方利益相关者价值需求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大学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部分(李福华，2007；刘爱东，2008)。内部治理侧重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主(吴丁玲和胡仁东，2018)；外部治理关注的是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社会监督之间的关系为主(沈刘峡等，2018)。

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学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克拉克关于“忠诚”的价值体系要求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具备三类“实用”的社会价值：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或政治价值(Clark, 1983)。高校作为一

个实体先于高等教育(程广文和赵捷, 2012), 从外部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 高校的社会价值即体现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首先, 关于社会经济价值, 高校通过培养应用型的专门人才, 实现其社会经济价值, 是高校人才培养内在属性的体现; 通过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去间接地实现高校的社会经济价值, 是其科学研究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而高校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正是高校服务社会的属性在社会经济价值发面的具体表现(毕宪顺和张峰, 2014)。其次, 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发挥其社会文化价值, 高校通过人才培养, 培养一批热爱中华文化的人才, 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 通过文化研究, 不断推动文化发展, 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同时, 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动力, 高校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表现(韩延明和栾兆云, 2010)。最后, 我国高校的社会政治价值在于高校的政策导向性。高校运用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的功能, 去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 实现其社会政治价值(毕宪顺和张峰, 2014)。陈骏(2017)指出, 由于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政治与上层建筑属性, 一国的大学必然会着眼于该国及其民族自身的生计。

2009年,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高等教育公报中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在机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下, 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大核心功能实现高校对社会的责任。在国外, 20世纪初, 范·海斯的“威斯康星理念”创立了“大学为全州服务”的范式, 使“服务社会”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三大内容, 且“服务社会”的使命正向纵深发展(克尔, 2011)。在国内, 教育部、财政部在2012颁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引导高校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现代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人才, 还要进行科学研究, 也要积极为社会提供服务。顾海良(2010)、鲁武霞(2017)、林杰和张德祥(2017)等学者将大学的社会责任归纳为教育责任、学术责任、既要服务又要引导社会前进的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则明确提出要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着重强调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的目的是化解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秩序, 保障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 由此可见, 提高大学治理能力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是实现大学价值增值的关键。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关系研究还比较匮乏。在现有的研究中, 一方面, 关于内部治理与大学价值增值。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推动着大学

的发展,影响着学科发展、教学质量、科研活动等方方面面,加强学术权力,实现学术本位,才能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李海萍,2011;龚放,2015)。另一方面,关于大学外部治理与价值增值。教学质量监督评估机制有利于提升高校教学质量(马海群,2015);政府和社会对科研活动的监督和检验有利于促使高校提高科研效率,提高科研成果质量(王涛等,2014;李铁,2015)。

综合国内外关于大学治理和价值增值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大学治理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维度,但却鲜有学者提出关于大学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大学治理能力进行评价;第二、学术界认为大学价值外在地体现在其三大社会价值,内在地体现在其三大社会责任,但鲜有学者对大学价值增值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并提出其衡量标准;第三、大学治理是大学能否实现其价值增值的重要土壤,大学治理与大学价值增值的内在关系需要进一步揭晓。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安排:首先,建立大学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大学治理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界定大学价值增值的概念,提出我国大学价值增值的具体路径和衡量标准;最后,深入分析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同大学治理结构对大学价值增值的影响程度,为高校提高大学治理能力提供切入点。

二、大学治理研究

(一)大学治理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前文文献分析,结合大学治理相关理论,本文认为我国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充分协调大学的内外部关系,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最终确保大学理念的实现,而利益相关者之间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就是大学的治理结构。大学的治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大部分,内部治理旨在合理界定党委及校长形成的行政权力和教授形成的学术权力;外部治理旨在解决政府、社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关于大学内部治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主体、性质、运行规则均不同,两者既统一又矛盾,两者产生和发展均统一于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内生需要,且目标一致,同时又在运行方式、作用客体、文化价值根源上相冲突(刘献君,2012;袁飞,2015)。为优化自身,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断增强,同时又在不断博弈,形成“纳什均衡”,最终大学通过构建学术权力为主导、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制衡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加强内部活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对于大学外部治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大学外部治理的核心议题是大学多重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政府、大学和社会机构是其主要涉及的三大权力(利)主体,故大学外部治理的主体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社会通过监督机制作用于大学,参与大学治理(黄彬,2016)。

大学治理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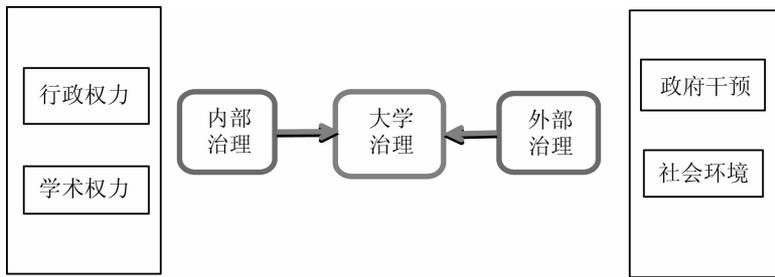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治理概念模型

根据大学治理概念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学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学内部治理选取了大学章程、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地位、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学术事务决定、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等7个指标;外部治理选取了外部审计检查、总会计师等2个指标。共使用9个指标来计算大学治理得分。具体说明如下:

1. 内部治理指标

(1)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行,主要就办学宗旨、内部管理体制及财务活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全面规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是大学办学的纲领性文件,是政府、社会及大学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陈立鹏,2012)。本研究认为制定大学章程并已通过审核的大学,其大学内部治理更加有效。

(2)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需要有合理的产生机制与人员结构,当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或分管副校长担任,会造成委员们决策时往往唯学校领导“马首是瞻”,在某种角度上使行政权绑架了学术权,学术决策失去了独立性。本研究认为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由非校长担任时,学术权力更有保障,更易形成“学术权力、行政权力适当分离,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权力制衡”的运行模式,即大学内部治理越有效。

(3)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能够强化

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职能,本研究认为,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小于等于 $1/4$ 的大学更易形成“学术权力、行政权力适当分离,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权力制衡”的运行模式。

(4)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当学术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成员多为二级行政权力的代表(如院长)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时,真正的学术权威则不易进入,教授的发言权还不够。所以,本研究认为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超过 $1/2$ 时,大学内部治理更有效。

(5)学术委员会地位。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三章第40条规定:“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认为,学术委员会是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大学,大学内部治理更有效。

(6)学术事务决定。本研究认为当学术委员会章程中体现学术事务由教授做主而非校级领导决定时,学术权力更有保障,大学内部治理更有效。

(7)董事会。董事会制度作为一种对外可协调政府、市场与大学三者关系,对内可协调大学内部行政、学术等各种权力的管理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行业特色大学引入大学治理结构中,并在形成分权制衡结构、提高管理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认为,如果大学设置了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则大学内部治理更有效。

2. 外部治理指标

(1)外部审计检查。外部审计即高校聘请或有关部门委派社会上专职的中介机构——审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署直接出面,对高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审计和监督检查,这是一种具有极大威慑力的外部监督机制,有利于防范“内部人控制”和自我袒护,对于强化高校财务监督、提高监管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大学外部审计检查是反映大学外部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大学外部审计检查结果良好时,该校接受的外部监督更有效。

(2)总会计师。2011年,为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完善高等学校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会计师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教育部和财政部颁布《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高校总会计师的设置总则、任免和职权情况,明确提出“总会计师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选聘、委派,可根据工作需要,实行异校或异地任职,依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免”。本研究认为大学是否设置总会计师是反映大学外部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完善政府监督机制的重要体现,当大学设置总会计师时,该校的外部监督更有效,即政府可以对大学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大学治理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大学治理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内部治理	大学章程	制定了大学章程并通过教育部审核的取值为1, 否则为0
	学术委员会主任	非校长担任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学术委员会地位	学术委员会是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各大学章程中显示)
	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	设置了取值为1, 否则为0
	学术事务决定	学术委员会章程中体现学术事务由教授(但不是校级领导)做主的取值为1, 否则为0
	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	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小于等于1/4的取值为1, 超过1/4的取值为0
外部治理	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	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的哑变量, 超过1/2的取值为1, 小于等于1/2的取值为0
	外部审计检查	综合整改率处在中位值以上, 取值为1, 小于等于的取值为0
	总会计师	是否设置总会计师的哑变量, 设置了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因为目前部属高校总会计师均是教育部任命, 相当于外审)

(二)大学治理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择2012—2015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对象, 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直属高校官方网站手工查询、整理大学治理各项指标, 将每所高校各项指标得分加总, 得到各高校大学治理总得分,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治理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治理现状

年份	平均值	中位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2012	1.67	1	7	0	1.67
2013	2.83	2	8	1	2.00
2014	5.59	6	9	0	2.50
2015	7.33	7.5	9	4	1.25

根据表2可知, 2012—2015年间,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治理情况逐

步提升。首先,大学治理得分平均值、中位值由2012年的1.67分、1分分别上升到2015年的7.33分、7.5分,分别提高了3.39倍、6.5倍;其次,大学治理得分的最大值及最小值由2012年的7分、0分分别提高到2015年的9分、4分;最后,大学治理得分的离散程度也趋于减小,2012年标准差为1.67,2015年为1.25。整体而言,75所部属高校大学治理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三、大学价值增值研究

(一)大学价值增值衡量标准

从外部看,以克拉克理论为主要依据,高校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文化传承的目标以及培养出具备政治素养的社会化公民。首先,高校通过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和产出创造性科研成果实现经济价值(王烽,2000);同时,现代大学已经日益走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成为仅次于政府的主要服务站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社会服务实现其社会经济价值追求(毕宪顺和张峰,2014)。其次,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发挥其社会文化价值,高校通过人才培养,培养一批热爱中华文化的人才,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时,高校通过文化研究,不断推动文化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动力,高校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表现(魏小琳,2012;欧小军,2013)。最后,研究我国各级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便可剖析高校的价值,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不断增加资源配置以实现高等教育进行扩招的重要原因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适应世界产业转移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可见我国高校有一定的政治导向性,高校在特定时期是一种政策工具,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价值(毕宪顺和张峰,2014)。

从内部看,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高等教育公报为基础,高校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以功能为导向,高校办学的社会责任就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责任是实现高校价值的核心路径。20世纪初,范·海斯的“威斯康星理念”创立了“大学为全州服务”的范式,使“服务社会”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三大内容(钱丽霞,2005)。关于高校的具体社会责任,中国C9院校进行了研讨,众多校长分别指出:大学要在精英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文化引领社会等方面作出表率,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应大力推进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与社

会服务体制改革；高校的每项功能都渗透社会责任，才能引领创新；高校应把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并要有资源和制度保证(余小波，2011)。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履行其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向社会输出更丰富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培养适应自身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需要的未来公民，故大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同时，如何更好地履行这三大责任，也是实现高校价值增值的重要内容。

高校的社会价值是高校价值的外延，通过高校内在价值表现出来，是高校的具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后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体现，体现了高校自身价值的实现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高校的社会价值又折射出外界环境对高校价值实现的需求。大学因社会需求而存在，又因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高振强，2014)。社会的日益进步对高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也在不断充实自身的价值内涵，以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方面实现动态的价值增值，从而适应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不断发展。而高校自身内生动力促使高校自身不断实现的增值会反向促进社会的发展。高校的价值增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动态发展的方面：经济发展新要求下的高校价值增值，社会文化发展新要求下的高校价值增值，政治发展新要求下的高校价值增值。

高校责任、社会价值与高校价值增值的动态关系如图2所示。

根据图2可知，大学价值增值具体表现在教学价值增值、科研价值增值与社会服务价值增值三方面，大学价值增值的衡量标准也必须涵盖这三方面。

然而目前尚没有一个成熟的衡量大学价值的方法或体系，但却存在着单独衡量大学某一价值或综合衡量的方法，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包括学科评估、高校科研评价以及大学排名。

学科评估是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进行水平评估，该项工作于2002年首次在全国展开，每4年进行一次，目前已经完成四轮评估。关于高校科研评价，2013年11月29日，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高校科研评价导向与工作重点。为引领高校的健康发展，中国高校科研评价制度的发展经过了行政评议、同行评议、指标量化评议和国际科研计量评价，评价方式日趋合理。

对于大学排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出版的《质量保障与认证基本术语集》，大学排名是一种衡量大学表现的可比技术，为大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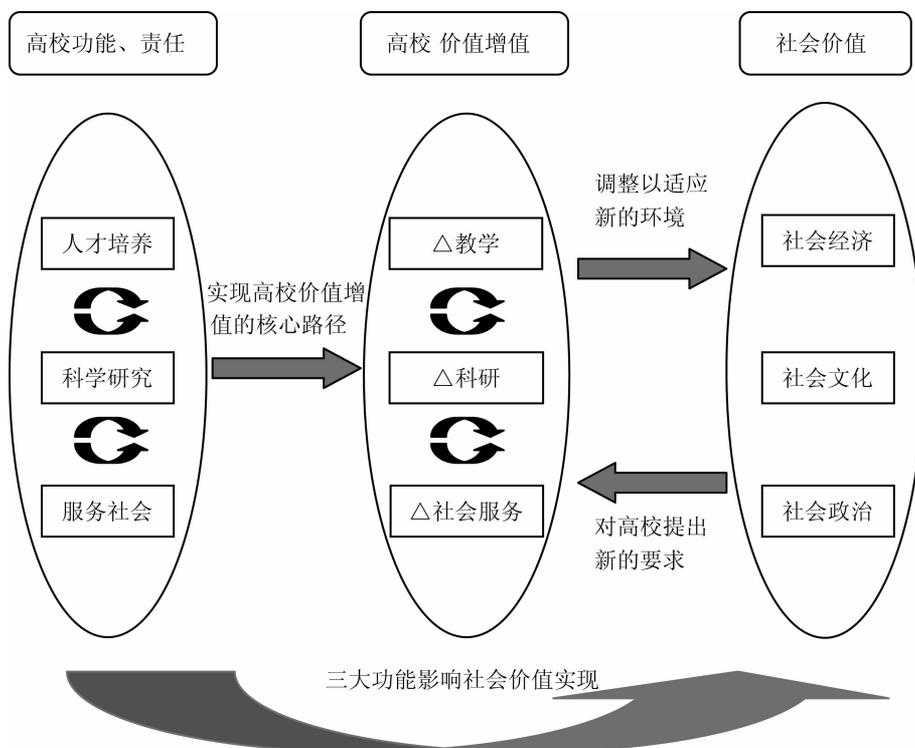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责任、社会价值、高校价值增值的动态关系

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测量的差异信息(Vlasceanu and Grünberg, 2005)。大学排名是一种社会评价方式,其采用定量方法,对大学的综合或单项质量进行客观的评分或划分等级,简洁直观地呈现出大学之间的差异,让公众了解高等教育现状的同时,给学校提供了自我提升的方向(黄欣,2006)。伍宸(2012)将大学排名价值取向分为终极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终极价值取向即大学的办学目标,它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方面。工具价值取向即大学为达到办学目标采用的工具或依赖的路径,包含大学规模、学科数目、教师数、重点学科数等。大学排名是一种对大学价值的综合评定方式。

对于上述三种方式,首先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学科评估是对我国高校进行分学科评价,并不是对学校整体价值的综合评价且学科评估每4年一次,可提供的数据较少;其次,大学价值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方面,且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大学的社会服务价值是通过教学与科研转化而来,故评价内容中至少应包含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由此本文排除了仅包含科研价值的高校科研评价,认为选择大学排名衡量大学价值最为合理。

大学排名最早发轫于西方,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美国大学为

评价对象,推出全美大学排行榜,之后众多新闻媒体效仿其进行排名并公布调查结果。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提供的数据首次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进行了排名。目前,在众多排名中,有13个具有一定知名度,分别是QS世界大学排名、Times泰晤士世界高等教育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上海交通大学)排名、武书连大学排名、沙特CWUR、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SCIImago大学排名、土耳其URAP、台湾NTU、荷兰莱顿世界大学排名(CWTS)、华尔街日报排名(US College Rankings)和4ICU大学排名。

对众多大学排名进行筛选。首先,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筛选。由于大学价值增值是增量,故研究2012—2015年直属高校大学治理、财务管理与价值增值关系,需要2012—2016年大学价值数据,在13个排名中剔除了无法获得具体指标体系及权重的荷兰莱顿世界大学排名(CWTS)、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以及华尔街日报排名(US College Rankings),只能获得2016年数据的4ICU排名,无法获得2012年、2013年中国大学排名数据的沙特CWUR以及2014年10月才首次推出的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其次,基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应该至少包含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内容,剔除了仅包含科研评价的世界大学学术(上海交通大学)排名、SCIImago大学排名、土耳其URAP以及台湾NTU。最后,基于我国直属高校样本量的充足性,对剩余的QS世界大学排名、Times泰晤士世界高等教育排名、武书连大学排名在2012—2016年期间、有明确排名的直属高校数目进行整理,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对于我国直属高校,QS世界大学排名、Times泰晤士世界高等教育排名的有效数据过少,不宜选为数据来源,故本研究选取武书连大学排名结果为大学价值的度量方式。

表3 2012—2016中国直属高校具有明确排名的数量

大学排名	中国直属高校具有明确排名的数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前400名)	8	10	12	12	12
Times泰晤士世界高等教育排名 (世界大学前100名)	2	2	2	2	2
武书连大学排名(中国大学前400名)	68	72	64	64	69

注:数据来源为<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武书连:《挑大学、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系列丛书,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武书连大学排名是武书连以教育部科技司、社科司、管理信息中心的公

开数据,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发布的SCI论文及引用数据,美国史蒂文理工学院工程信息公司发布的《工程索引》论文数据,经过1996年、1997年跨年度连续6个月对1927名专家(专家资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3轮问卷调查后,提出的大学排名,指标分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一级指标。本文选取了武书连大学排名衡量大学价值增值,如果在武书连排名中,大学次年排名上升,则价值增值指标取1,否则取0。

(二)大学价值增值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择2012—2016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对象,通过武书连大学排名官方网站手工查询、整理大学排名,若大学次年排名上升,则价值增值指标取1,否则取0,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价值增值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价值增值现状

	平均值	中位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2012	0.31	0	1	0	0.47
2013	0.33	0	1	0	0.47
2014	0.31	0	1	0	0.47
2015	0.34	0	1	0	0.48

由表4可知,2012—2015年间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价值增值略有提高。大学价值增值的平均数由2012年的0.31提高到2015年的0.34,2012年实现大学价值增值的学校有20所,到2015年则增加到22所,实现大学价值增值的学校数量也有所增加。整体来看,我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越来越多的高校实现了大学价值增值。

四、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与数理统计方法相比,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数据分布没有特殊要求。关联度是定量描述事物或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大小、方向与类型等的量度,这个量度越大,说明它们之间的关联越密切;反之,关联越远。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弥补了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的不足,在教育领域有广泛的应

用。其中,最典型的是姜华(2017)运用该方法研究了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内在关系,在数据处理中,剔除数据缺失值后,将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每项指标下各高校数据汇总,得到2012—2015各年各指标的总量数据,该总量数据能够综合反映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高等教育”样本信息。

(一)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关联度模型的建立

1. 确定原始数据列

设为大学价值增值数列,故参考数据列为: $x_0(k) = \{x_0(1), x_0(2), \dots, x_0(k)\}$,其中 k 表示年份, $k=1, 2, 3, 4$ 。

设为大学治理数列,故比较数据序列为: $x_i(k) = \{x_i(1), x_i(2), \dots, x_i(k)\}$,其中 $i=1, 2, \dots, 9$, x_i 分别表示大学章程(x_1)、学术委员会主任(x_2)、学术委员会地位(x_3)、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x_4)、学术事务决定(x_5)、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x_6)、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x_7)、外部审计检查(x_8)、总会计师(x_9)。

2. 标准化处理

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为便于分析并保证各因素具有等效性和同序性,应对原始数列进行处理,本文采用的是各列除以相对应的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 $y_i(k) = \frac{x_i(k)}{\frac{1}{N} \sum_{k=1}^N x_i(k)}$ 。其中, $i=0, 1, \dots, 9$,得到大学治理

与价值增值的标准化矩阵,如下:

$$y_i(k) = \begin{bmatrix} y_1(1) & \cdots & y_1(k) \\ \vdots & \ddots & \vdots \\ y_i(1) & \cdots & y_i(k) \end{bmatrix}$$

其中, $i=0, 1, 2, \dots, 9$; $k=1, 2, 3, 4$ 。

3. 产生对应差数列表

将标准化后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进行差值计算,并求绝对值,将之列入对应差数列表,内容包括与参考数列值差(绝对值)、每列最大差和每列最小差。差值为:

$$\Delta_i(k) = (x_i(k) - x_0(k))$$

在此基础上,计算最大差值和最小差值,分别为:

$$\Delta_{\max} = \max_i \max_k |x_i(k) - x_0(k)|$$

$$\Delta_{\min} = \min_i \min_k |x_i(k) - x_0(k)|$$

4. 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在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之前,需要预先设定分辨系数,通常以 x 表示分辨系数, $0 < x < 1$,一般可设 $x=0.5$ (采取数字最终务必使关联系数计算的 $x(k)$ 小于 1 为原则),分辨系数之设定值对关联度并没有影响^①。在此,我们设分辨系数 $x=0.5$,分别计算比较数列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x_6 、 x_7 、 x_8 和 x_9 对参考数列 x_0 的关联系数,其计算公式见下式:

$$\xi(k) = \frac{\min_i \min_k |x_i(k) - x_0(k)| + \xi \max_i \max_k |x_i(k) - x_0(k)|}{|\min_i \min_k |x_i(k) - x_0(k)| + \xi \max_i \max_k |x_i(k) - x_0(k)|}$$

根据关联系数计算关联度,关联度 $r_i = \frac{1}{N} \sum_{k=1}^N \xi(k)$ 。关联度反映了大学治理各部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程度, r_i 越大,则贡献程度越大。

(二)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内在关系实证分析

1. 确定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原始数据列

将大学治理和价值增值各项指标下各高校数据汇总,得到 2012—2016 年的“高等教育”样本信息,原始数据如表 5 所示。

表 5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原始数列

指标		2012	2013	2014	2015	均值
价值增值	大学价值增值(x_0)	20	21	20	22	20.75
	大学章程(x_1)	0	5	43	64	28.00
	学术委员会主任(x_2)	11	21	43	54	32.25
	学术委员会地位(x_3)	11	18	45	63	34.25
	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x_4)	6	12	37	51	26.50
大学治理	学术事务决定(x_5)	10	13	28	41	23.00
	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x_6)	14	14	37	53	29.50
	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x_7)	10	15	36	55	29.00
	外部审计检查(x_8)	35	64	59	56	53.50
	总会计师(x_9)	10	19	30	32	22.75

2.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数据标准化处理

将原始数列除以相对应的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各指标的均值如表 4 所示,标准化后的数据如表 6 所示。

^① 不同的分辨系数便可得不同的关联度数值,关联度的具体数值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关联序。

表6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标准化数据列

	$y_i(k)$	2012	2013	2014	2015
价值增值	y_0	0.964	1.012	1.000	1.060
	y_1	0.000	0.179	1.536	2.286
	y_2	0.341	0.651	1.333	1.674
	y_3	0.321	0.526	1.314	1.839
	y_4	0.226	0.453	1.396	1.925
大学治理	y_5	0.435	0.565	1.217	1.783
	y_6	0.475	0.475	1.254	1.797
	y_7	0.345	0.517	1.241	1.897
	y_8	0.654	1.196	1.103	1.047
	y_9	0.440	0.835	1.319	1.407

3. 产生大学治理对应差数列表

将标准化后的大学治理比较数列与价值增值参考数列进行差值计算, 取绝对值后求最大差值和最小差值。差数列表如表7所示。

表7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对应差数列表

$l(k)$	2012	2013	2014	2015	min	max
$ y_0(k) - y_1(k) $	0.964	0.833	0.536	1.225	0.536	1.225
$ y_0(k) - y_2(k) $	0.623	0.361	0.333	0.614	0.333	0.623
$ y_0(k) - y_3(k) $	0.643	0.487	0.314	0.779	0.314	0.779
$ y_0(k) - y_4(k) $	0.737	0.559	0.396	0.864	0.396	0.864
$ y_0(k) - y_5(k) $	0.529	0.447	0.217	0.722	0.217	0.722
$ y_0(k) - y_6(k) $	0.489	0.537	0.254	0.736	0.254	0.736
$ y_0(k) - y_7(k) $	0.619	0.495	0.241	0.836	0.241	0.836
$ y_0(k) - y_8(k) $	0.310	0.184	0.103	0.014	0.014	0.310
$ y_0(k) - y_9(k) $	0.524	0.177	0.319	0.346	0.177	0.524

由表7对应差数列表得知: 就大学治理的九项指标而言, 各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各点对应差值中之最小差值为 $\min\{0.536, 0.333, 0.314, 0.396, 0.217, 0.254, 0.241, 0.014, 0.177\} = 0.014$, 即 $\Delta_{\min} = 0.014$ 。各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各点对应差值中之最大差值为 $\max\{1.225, 0.623, 0.779, 0.864, 0.722, 0.736, 0.836, 0.310, 0.524\} = 1.225$, 即 $\Delta_{\max} = 1.225$ 。根据这些计算结果, 计算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4. 计算大学治理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根据公式(1)以及对应差数列表,计算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的关联系数与关联度,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大学治理与价值增值关联系数与关联度

指标	2012	2013	2014	2015	r_i
大学章程(x_1)	0.397	0.433	0.545	0.341	0.429
学术委员会主任(x_2)	0.507	0.643	0.662	0.510	0.581
学术委员会地位(x_3)	0.499	0.57	0.676	0.450	0.549
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x_4)	0.464	0.534	0.621	0.424	0.511
学术事务决定(x_5)	0.548	0.591	0.754	0.469	0.591
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x_6)	0.568	0.544	0.722	0.464	0.575
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x_7)	0.508	0.565	0.733	0.432	0.56
外部审计检查(x_8)	0.679	0.786	0.875	1.000	0.835
总会计师(x_9)	0.551	0.793	0.672	0.653	0.667

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大学治理九项指标对大学价值增值的相对关联度都超过了0.4,说明,大学治理各部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相对而言都比较大。大学治理的九项指标关联度的排序为: $x_8 > x_9 > x_5 > x_2 > x_6 > x_7 > x_3 > x_4 > x_1$ 。

其中,外部治理的两项指标对大学价值增值的关联度最大,说明高校外部治理能力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最大。首先,外部审计检查对大学治理的关联度为0.835,高校外部审计检查是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的审计,相对于高校内部审计而言,比较客观公正,社会监督力度较大,作为社会参与监督的重要方式,外部审计检查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总会计师对大学治理的关联度为0.667,高校总会计师由政府任命,反映了政府对高校的监督情况,高校设置总会计师,在政府监督下,大学治理能力会明显提高,从而提升大学价值。再次,内部治理中学术事务决定(x_5),学术委员会主任(x_2),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的比重(x_6),学术委员会中教授委员的比例(x_7),学术委员会地位(x_3)反映了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能力的强弱,其关联度分别为0.591、0.581、0.575、0.560、0.549,其关联度均在[0.5, 0.6]范围内,关联度较大。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的载体,学术委员会在大学治理中的决策能力反映了高校学术权力的大小,学术权力越大,内部治理能力越强,越能促进大学价值的增值。最后,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x_4)、大学章程(x_1)的关联度分别为0.511和0.429,说明设置

董事会或理事会、颁布大学章程的高校，内部治理能力较好，在一定程度上亦能促进大学价值的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择2012—2015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对象，对大学治理、价值增值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首先，建立大学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大学治理现状进行分析，我国大学治理情况有很大改善；其次，基于高校责任、社会价值与价值增值的动态关系科学界定大学价值增值，并提出以武书连大学排名来衡量我国大学价值及价值增值，我国大学价值在逐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大学治理与大学价值增值的内在关系，相对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较大；外部治理中，相较于政府监督，社会参与大学外部治理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更大；内部治理中，相对于董事会或理事会机构、大学章程，学术委员会对大学价值增值的贡献度更大。

基于此，本文认为高校需进一步优化大学治理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外部治理建设中，要加快推进大学的法人化建设，提高高校信息公开透明度，构建专业中介评估组织，强化社会监督。在内部治理建设中，要增强学术本位，强化学术委员会作用，积极探索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高校应在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努力提升自身大学治理能力，提高价值增值。

[参考文献]

- 毕宪顺、张峰，20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及其战略意义》，《教育研究》第11期。
- 陈骏，2017：《一流大学的责任与担当》，《中国高教研究》第12期。
- 陈立鹏，2012：《大学章程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程广文、赵捷，2012：《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外延及其意义》，《湖北社会科学》第11期。
- 高振强，2014：《社会服务导向下的现代大学组织变革——基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实践》，《教育发展研究》第5期。
- 龚放，2015：《以治校为志业：大学治理的新常态》，《高等教育研究》第10期。
- 顾海良，2011：《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基于“社会责任”的观察与思考》，《高校理论战线》第4期。
- 韩延明、栾兆云，2010：《我国现代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 黄欣、吴志功，2006：《美国大学排行的产生与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第4期。

- 黄彬, 2016:《大学外部治理的法权逻辑与重构路径—基于“管办评分离”的政策视角》,《中国高教研究》第11期。
- 黄兢, 2015:《我国地方大学治理的特征,模式与道路》,《中国高教研究》第8期。
- 姜华、黄帅、杨玉凤, 2017:《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与绩效的关系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复旦教育论坛》第4期。
- 克尔, 2011:《大学之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福华, 2007:《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管理体制创新》,《教育研究》第7期。
- 李海萍, 2011:《高校学术权力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第10期。
- 李立国, 2018:《现代大学治理形态及其变革趋势》,《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
- 李铁, 2015:《校企合作与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经济纵横》第1期。
- 林杰、张德祥, 2017:《权力、能力、责任视域中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解读》,《高等教育研究》第11期。
- 刘爱东, 2008:《利益相关者理论视界下的大学治理价值取向分析》,《中国高教研究》第5期。
- 刘献君, 2012:《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
- 鲁武霞, 2017:《大学对社会的依赖、责任及文化回应——协同文化培育的视角》,《江苏高教》第10期。
- 罗红艳, 2014:《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第3期。
- 马海群, 2015:《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与工作体系构建》,《情报资料工作》第1期。
- 钱丽霞, 200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推进战略与实施建议》,《全球教育展望》第11期。
- 沈刘峡、周忠林、郝培文、旺德、南国君, 2018:《基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8期。
- 王烽, 2000:《高等教育经济价值:知识经济的挑战》,《辽宁教育研究》第9期。
- 王涛、夏秀芹、洪真裁, 2014:《澳大利亚科研管理和监督的体系、特点及启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11期。
- 伍宸、洪成文, 2012:《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研究——基于价值哲学的解释》,《中国高教研究》第12期。
- 吴丁玲、胡仁东, 2018:《大学组织内部治理中行政权力的制度设计——兼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江苏高教》第9期。
- 荀渊, 2014:《治理的缘起与大学治理的历史逻辑》,《全球教育展望》第5期。
- 余小波、张晓报, 2011:《近十五年国内大学社会责任研究的简要综述》,《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1期。
- 袁飞, 2015:《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统一、冲突与平衡》,《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
- 张维迎, 2004:《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irnbaum, R. , 2004, “The End of Shared Governance: Looking Ahead or Looking Back”,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2(7): 5—22.
- Clark, B. R. , 1983,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 Nation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son, J. J. , 1960,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McGraw-Hill.
- Gayle, D. J. et al. , 2003,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Approaches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ssey-Bass.
- Vlasceanu, L. , and L. Grünberg, 2005,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A Glossary of Basic Terms and Definitions”, *NEESCO-CEPE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Value Added

YANG Rong, LIU Ting-ting, WANG W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75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2—2015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determine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of university value-added, and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value added by using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university value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Compared with internal governance, external governance ha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ity value added. In external govern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contributes more to university value added tha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internal governance, the academic committee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university value added than the board or council body and the university charter.

Key wor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value adde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刘泽云 责任校对: 刘泽云 孙志军)